

中医“象思维”的文化溯源^{*}

王慧娟, 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摘要:“象思维”是中医学最具代表性的思维方式之一,其形成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象”的语义扩展和思想演变与古人早期的“通天”实践紧密相连。随着西周末期人文理性的逐渐觉醒,“象”的涵义从宗教神学背景下的“龟象”、“易象”实现了向自然之“道象”、“气象”的理性超越,“象”最终获得了作为“气”的显露萌兆的变化状态的本质内涵,并受秦汉系统宇宙模式的规范而具有了系统类化的特点。“象”作为认知中介的符号模式,在整个演变过程中保持着特有的连续性。成熟于这一时期的中医学正是基于这些人文领域的思想成果才建立起以“象”为理论特点和思维特点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象思维; 道; 气; 类; 通天

中图分类号: R2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23(2014)05-0045-04

尚“象”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品貌,也是中医学最为鲜明的性格特点。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王树人先生提出“象思维”^[1]这一概念,后经刘长林先生将其运用于中西科学思想体系的比较研究^[2]以来,“象思维”逐渐受到中医学界的重视,并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象思维”作为中医具有代表性的、有别于西方现代医学的思维方式,已取得学界的普遍认同。现有研究主要是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出发对“象思维”的内涵、特点、价值等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系统的考证和剖析,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但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3],如“象”的本质与分类,“象思维”的具体途径和方法等。针对此现状,本文尝试采取间接路径,即从产生这种思维的具体文化背景出发,循着“象”的涵义扩展和演变的历史线索,发掘“象”在原有意义系统中的自身内涵、思维特点及其作用和地位,为深入理解中医“象思维”提供一种文化背景和意义系统的参照,以期有助于弥补比较视野下对相关重要内容的可能忽略与分析不足。

1 “象”的语义考源

对“象”的语义考源虽然可追溯至殷商的甲骨文,但在甲骨“象”字出现以前,“象”所意指的内容

可能就已存在于古人的口头语言或一些特殊符号里,因此对“象”的语义考源实际应该追溯更为悠久的历史。

1.1 殷商甲骨文:一种神圣的动物

“象”字的最初涵义指动物“大象”。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象,南越大兽,长鼻牙,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南越”即古时的南粤,今天的华南地区,象是那里生活的一种体格庞大的动物。据考古学家考证,早从旧石器时起,直至殷商时期,我国黄河流域也有大象生息繁衍,后因气候转冷,被迫南迁^[4]。殷商甲骨文中的“象”字和“为”字,以象为形,说明那时不但有象,而且还被驯化用于劳役,可见象与当时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5]。此外,象还有被用于战事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言:“殷人服象,为虐于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殷人服象”,大概是后代人存有的关于殷人的一种久远印象,这种印象或许还与殷人对象的图腾崇拜有关。殷人的祖先“舜”有着很多“象为之耕”的传说。“象”被作为一种图腾,不仅用于祭祀与仿形制器,还被用于命名氏族方国,甚至作为殷王的名号,可见象在殷人心目中确有异常神圣的地位。对于后代人来说,象之于殷人甚至具有符号般的意义。相传周初

^{*}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2011CB505402)

收稿日期: 2014-07-03

作者简介: 王慧娟(1982-),女,甘肃镇原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医哲学、中医认知思维和中医心理学方向研究。

[△]通信作者: 张其成, E-mail: zhangqicheng96@163.com.

的庆功舞乐《大武》又被命名为《象》,可能是由于武王率领的军队击溃了以“服象”著称的殷人,这种命名其实是将殷人与象进行了关联,后来引申出的“象征”涵义可能源于此。这种关联式的命名或许可以看作是“象”字涵义扩展的最初方式。

1.2 西周时期:象与卜筮的关联

“象”字从最初的动物大象衍生出后来的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普遍所指,仅仅依赖图腾崇拜的神圣性可能还不够,当代著名美学家汪裕雄先生推测“象”与殷人的“龟卜”发生关联或许是更为关键的一步^[6],此认识颇有见地。《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龟者,象也。”“龟”在这里指龟兆,即龟卜过程中灼烧龟甲所显裂纹的样子。这种将“象”与“龟兆”联系起来的说法大概在比春秋更早的西周时期可能就已经出现。龟卜曾是殷人重视的占卜形式,这种形式不仅充当了古人沟通天人的重要媒介,还寄托着他们的原始信仰和宇宙观念^[7]。考古学家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灼烧兽骨取兆的占卜形式^[8],可见这种通天实践有着久远的传统。殷人龟卜的具体过程是先将龟的腹甲烧灼显出裂纹,然后将这种裂纹对应于相关的自然物象,再依据不同物象的解说断语,最后得出吉凶启示。在这种由“龟兆—自然物象—占辞”的占卜过程中,“象”是其中关键的一环,龟甲的裂纹和相对应的物象共同组成了一种能够指向幽冥未知情状的意指符号,体现着上帝神秘意志的告诫和启示。解说之辞依附于象,体现了古人对于事物的早期分类及其所挟带的情感价值判断。这种龟象符号系统与中国文化特有的重直观体悟、重感性经验的思维方式有着内在的渊源。

龟卜方式到了西周,与周人原有的以蓍草为工具“筮占”方式相结合。“筮者,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筮占是以“数”取断,与龟卜以“象”取断不同。周人占卜所倚重的占书称为《周易》,即《周易》古经。西周建立后,周人吸收龟卜法,在原有筮占系统中加入“象”的环节,将依揲筮程序所得的“数”与一定的“象”对应起来,由数过渡到“象”,再依所对应的辞做出吉凶断语。这种从“数—象—辞”的占筮过程与龟卜过程有着结构上的一致性,即都以“象”作为中介连接两端。与之不同的是,新的筮占依一定程序揲筮取数比灼烧龟甲取象有了更多的人为规范性,筮数所对应“象”的范围也比龟卜原来的自然物象多了向人文事象的扩展,在卦象的解释上重

视卦中爻位变化,显示了当时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从周人筮占对殷人龟卜的进一步发展可以看出,虽然同处天命神学的大的背景下,但人的理性精神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理性精神积蓄着一股变革的力量。

1.3 春秋时期的人文理性:象与道气的结合

西周末期,蕴藏于周礼文化内部的这股理性力量,终于觉醒乃至爆发,最终冲破了天命神学体系的禁锢,从而实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性超越。这一超越的实质在于新的宇宙观的出现,其萌芽可见于《国语·周语》中所载西周末年太史伯阳父用“天地之气”的失序和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来解释地震的事件,这已然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天命神意的解释方式。而真正将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给予系统阐发的是老子。老子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这里的“无”就是万物因它而生、因它而成的本原性存在,老子称之为“道”,这一最高哲学范畴的提出标志着古人对天地万物生成源起的理性探索的胜利,标志着对于天命神学桎梏的最终挣脱。

作为创生万物的本原“道”,老子形容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十四章),这就必然引出一个道如何认识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老子提出了“大象”说。“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河上公注:“执,守也;象,道也”,用“大象”来称呼“道”,相比之前占卜系统中的“龟象”、“易象”,“象”在这里被提升到与“道”齐等的本原地位,其涵义有了根本的变化。对于道的认识,老子正是采用“象”这种特殊的言说意指方式,即通过道所创生的有限物象来隐喻和象征进而指向本原无形的“大象”,正如韩非子所说:“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韩非子·解老》),老子借助“水”、“朴”、“母”、“根”等一系列物象来隐喻意指“道”。这种从“物象—意象—道(大象)”的方式无疑沿用了占筮系统的符号模式,虽然认识的对象已经从神秘的“上帝”转化成自然内在的本原之“道”,“象”的涵义也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作为沟通有形与无形、有限与无限的“象”的媒介作用却依然承续。因此汪裕雄先生评价老子的“象”论“发展、完善了中国原有的‘象’论,将中国原有的‘龟象’、‘易象’理论,提升到哲学高度,成为可以指称形而下世界和形而上世界,并且

足以沟通这两个世界的符号系统,这在中国文化一哲学史上,同样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6]

1.4 战国时期:“易者,象也”

新的宇宙观的提出,使原有神学天命观面临瓦解,作为周礼文化沟通天人媒介的《周易》,经历人文理性思潮的洗礼,最终借助老子的道论也实现了自身的哲学化,其标志就是战国时期《易传》“十翼”的形成。《易传》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高度重新阐发宇宙的变化规律,使得原有筮占中具有天启神秘意味的数,化身为阴阳二气相互作用所显示的天道运行规律,“象”也脱离原有筮占系统对数的依附,直接源于天道规律的垂显,成为圣民可以借以把握天道的依凭,“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传》),圣人所作之八卦,非依赖天命神意,而是得自于法象天地、观物取象,象非源于数,而是源于天。至此,原来的“筮者,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实现了向“易者,象也”(《周易·系辞上传》)的转变,在通达天道的过程中,“象”获得了优先于“数”的重要地位。

《易传》对“象”的论述使其具有了更加确切的涵义。《周易·系辞上传》言:“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王弼注:“兆见曰象,成形曰器。”这里用“兆见”来说明象,显然还存留着早期占筮系统中“以象解兆”的印迹,象在这里被描述为一种区别于有形之器,虽未成形却已“兆见”的状态。孔颖达疏:“前往来不穷,据其气也。气渐积聚,露见萌兆,乃谓之象,言物体尚微也。”说明象的这种“露见萌兆”的状态是气的状态,象的本质是气,这一点北宋的张载表述得更为明确,“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朱熹撰曰:“见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见象”而后“形器”,这是道创生万物过程中两个前后承继的生成过程,道生气,气先微萌显露为“象”,再逐渐积聚成有形之“器”,从“道(无形)—象—器(有形)”这一生成过程来看,象仍然居于中间环节。无形气象比有形万物更接近于道,道以象显,象是道的创生之“功”的显现;作为生成于道而又比它次一级的生生力量——“气”的显现,象又是有形万物生成直接原因的溯及对象,因此王树人先生又将其称为“原发创生之象”^[7]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对于象在生成次序上的认识,为圣人观象体道的反向认识过程提供

了本体论的基础,从有形物象出发,进而感知无形气象之大化流行,最终通向对超越感官及言语所及的本原创生之道的认知,象成为沟通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中介而不可或缺。“象”的涵义从老子“道象”到《易传》的“气象”逐渐贴近人们现实接触的自然世界,变得越来越能够被个体所把握。

1.5 秦汉时期的月令模式:象的系统类化

经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随着秦汉政权的大一统,思想文化领域也趋于融合统一。这种融合统一的突出特点是系统宇宙模式的形成,《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月令模式便是其代表,这种模式在随后的《淮南鸿烈》和《春秋繁露》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以月令模式的建构以阴阳五行为架构,阴阳五行的观念起源于很早的古天文历象之学,但真正进入思想领域则离不开春秋以降的人文理性的崛起和阴阳家的贡献,尤其是战国末期邹衍的“五德终始”将阴阳五行纳入历史朝代更替的周期性时间轨道,为后世帝王所重,也为建构以时统空的统一宇宙模式铺平了道路。阴阳五行的系统观念使得人们对道生成天地万物的认识更加细化而具体,《淮南鸿烈·天文训》描述:“道始于虚霁,虚霁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也有相应内容,“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比之于老子和《易传》对于宇宙生成过程的论述,这里的由道—气—阴阳—四时—五行的宇宙生成过程,使得气的运动变化规律在时间的序列中展开,又因阴阳五行的规范而变得更加具体和有序,天地万物、社会人事都被安置在这样一个井然有序而又循环流转的统一系统内。

在这种循环流转的系统宇宙模式下,气的变化规律的有序化使得人们对于显现气之变化的“象”的认识也归于有序化,或者可以称之为“类化”。《淮南鸿烈·要略》言:“《览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沦无形也,纯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揽物引类,览取拏掇,浸想宵类,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滞,决读奎塞,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阴阳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远观博见者也。”览观“冥冥”之道,可通过“揽物引类”、“喻意象形”,之所以

能够通达“无极”之道,即在于气性相类事物之间的彼此“感应”,如《淮南鸿烈·坠形训》所言:“皆象其气,皆应其类”,《吕氏春秋·应同》的:“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类的本质在于气性的通应,气性的通应源于四时阴阳五行的变化节律,类由此便与气的变化规律构成了某种联系,作为认知中介的“象”,于是被“类化”,即阴阳五行化,由“物象”到“类象”,然后才能通达对“道”的认识。受阴阳五行系统模式的规范,人体自身也成为与天地之道类化感应的小宇宙,“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形也。”(《淮南子·本经训》),天地之道具足一人之身,人通过自身便可感应天道变化,通过自身便可达到与天地的和谐通应。这样古人由“象”达“道”的“通天”路径就有了更为明确的类化导向和更为实在的身体依托。

2 总结与讨论

透过以上对“象”的涵义演变过程的简要分析和勾勒,基本可以呈现出古人对“象”的认识发展的大体脉络和轮廓。基于这一脉络和轮廓,可以将“象”的核心语义和思想内涵概括为 3 个方面:首先,“象”是古人“通天”实践的桥梁。在“天人相应”的大主题下,无论是西周之前的沟通天命神意的卜筮,还是春秋已将人文理性背景下的观象体道,“象”都是充当着认知的中介作用而贯穿始终。其次,“象”的本质是气的萌兆露见的变化状态。这一认识是古人理性精神崛起和探索自然能力提高的思想成果,原有主宰自然人事的天帝鬼神意志逐渐被自然本身内在之“道”所代替,原来显现天意神启的“龟象”、“易象”转而成为对天道所垂显的“象”的模拟,“象”作为“道”创生万物过程中所显现的天地阴阳之气交感变化的萌兆状态,而由此获得了其自身的实在性和本质内涵。第三,“象”作为人们认识的直接对象被赋予了系统类化的特点。随着秦汉系统宇宙观的深入人心,气的变化规律展现出以时间为主导的阴阳五行系统规范下的循环流转的有序节律,作为显现气的“象”也因此具有了系统类化的属性,人体小宇宙继而被打开,成为了与天地同构、气象通应的载体。

以上 3 方面的认识大致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中医“象思维”的文化背景。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体系正好经历以上时期而逐渐成熟和定型,体现其理论特色和思维特点的“象”正是源于上述

时期人文领域认识成果的影响和渗透,故而参照这些认识成果及其形成脉络,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中医所说的“象”。有关中医如何承续和发展上述人文领域对于“象”的认识成果,不作为本文的重点,笔者将另撰文详述。文章的最后提出几个问题,以作为下一步讨论的引子。

首先,“天人相应”是古人探索宇宙自然和社会人事的永恒主题,这一主题所隐含的假设是有一种共同的法则潜在地支配着自然与人事,这种法则曾经被视为神秘的上天意志,之后又被自然本身的道所取代,无论是哪一种,其相对于有限的人来说都具有永恒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的设定就决定了人必须通过某种中介来实现其认识上的跨越。因此,对中医所延续的以“象”为中介的认知模式的理解就需要考虑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主题选择及前提预设等问题。

其次,古人认为天地万物一气化生,气的运动变化是我们认识道的途径。气化生万物有一个由散到聚的过程,即表现为由“见象”到“形器”的过程,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个由几微到显著的过程,中医才重视对先机的把握和提出“治未病”的理念。气的运动变化节律又以四时五行为度,循环流转,天地万物同频共振,感通相应。这种对于气的周期节律性和内在联系的认识与中医所建立的系统类化的身体观(有学者成为“术数的身体观”^[10])和对疾病传变及转归的预测有内在的理论联系。因此理解中医“象”的本质需要以对于“气”的本身性质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为基础。

最后,关于理智与直观在认识“象”中的作用问题,中医在认识生命现象和诊疗疾病的过程中,对“象”的把握既依赖于细致的分辨识类,也依赖于守神静意的直观体悟。这是因为,在中医看来,人的感知思虑等精神现象,与人体其他生命现象一样,同是气化的产物,同处类化身体系统的某个位置而与其他部分感通相应,故而人体感知经验可以作为医生借以感通和把握疾病性质和趋向的有效工具。因此,以往对于中医直观体悟及“推类”方法有效性的质疑,或许需要从中医气化理论及其类化身体观本身来寻找解答,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 [1] 王树人. 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 (下转第 55 页)

体内驱赶出邪气或化邪气为正气。

参考文献:

- [1] 孙广仁. 中医基础理论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
- [2] 北宋周敦颐. 周敦颐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 [3] 费多益. 分形学: 整体论的扩展 [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0(6): 18-22.

- [4] 庞明. 智能气功科学基础—混元整体理论[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4.
- [5] 耿爱春, 杨天仁, 刘云平. 麻黄汤现代临床应用研究 [J]. 中医药信息, 2013(2): 75-77.
- [6] 李瑞娟, 王燕. 泻法临床应用体会[J]. 中医研究, 2012(2): 44-46.

(编辑: 徐建平)

Discussion on the Qi Motions of Human Body

SUN Ling-tong

(Graduate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ABSTRACT: The generalized concept Qi is all the matters and energies existing in the universe. The main forms of Qi motions include opening, closing, going out, coming in, gathering, scattering, and transforming of Qi.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Qi are opening and closing in essence.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treating diseases can be created by understanding the laws of human body's Qi motions in opening, closing, going out, coming in, gathering, scattering, and transforming.

KEY WORDS: Qi; Human body's Qi; Qi motions

(上接第 48 页)

- [2] 刘长林. 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兵、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3] 邢玉瑞. 中医思维方法研究进展述评(一)[J]. 辽宁中医杂志, 2011, 38(9): 1699-1701.
- [4] 许进雄. 古事杂谈[M].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97: 31-34.
- [5] 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 [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3: 266.
- [6] 汪裕雄. 意象探源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38, 32, 115.

- [7] [美]艾兰. 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23-138.
- [8] 李零. 中国方术续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218-231.
- [9] 王树人. 中国象思维与西方概念思维之比较 [J]. 学术研究, 2004(10): 5-15.
- [10] 李建民. 发现古脉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91.

(编辑: 徐建平)

An Outline of the Cultural Source of the “Image Thinking Style” in TCM

WANG Hui-juan, ZHANG Qi-che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mage”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hinking styles in TCM. I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The extensions and changes of the meaning of this term are mostly involved in the attempts of the ancients to communicate with heaven. As the rise of human rationality at the end of Xizhou dynasty, its meaning was transformed from “Guixiang” and “Yixiang” in the context of religious theology to “Daoxiang” and “Qixiang”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finally to the meaning formalized and systemized by “lei” affected by the systematic model of the cosmos in Qin and Han dynasty. There was a common cognitive sign pattern mediated by “image” that kept unchanged during the whole evolution. It was just based on these achievements tha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characterized by “image” was fully formed in these periods.

KEY WORDS: Image thinking style; Dao; Qi; Lei; Tongtian